

录取方式或变 留学英国影响几何?

□ 孙亚慧

日前,英国本科招生制度可能迎来改革的消息引发众多关注。改革后将取消之前学生所熟悉的“预估分”申请方式,转而要求以学生最终实际的 A-level 成绩申请英国大学。英国为什么要改变已使用多年的“预估分”方式?英国留学新政若最终落地实施,又将对中国学生产生哪些影响?

不再依据“预估成绩”

在英国,通常情况下 A-level 学制为两年,分为 AS 年级和 A2 年级。AS 年级结束时,学生参加 AS-Level 测试,老师会根据测试成绩和学生的平时表现,给出 A-level 预估成绩,这份预估成绩就成了高校判断是否给予学生“有条件录取”的重要依据。拿到“有条件录取”的学生,若在 A2 年级的 A-level 考试中,成绩达到高校的分要求,就能被最终正式录取。

但其中问题在于,预估成绩有时并不准确,现行录取方式对一部分学生来说并不公平,这也正是此次改革的重要原因。

尽管有一套严格程序来规范老师预估成绩,使其尽量保证准确和公平,但预估成绩仍是相对主观的评判,与学生考试的最终



成绩难免存在出入。客观上存在的预估误差,让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与心仪高校失之交臂,“低就”入学,也影响了高校录取。

根据英国全国大学申请机构 UCAS 的数据显示,2019 年被录取、老师预测可拿到 3 个 A 的 18 岁学生中,79% 的学生成绩被高估,8% 的学生成绩被低估。可见,学生的实际水平并不完全如老师预测的那样。

“高校按照预估成绩发了‘有条件录取’,结果出成绩后发现最终满足学校条件的学生并不多,甚至学校没招够人的情况也不鲜见。”启德教育英国项目总监孙波说。

录取方式改革后较先前的最大不同,在于英国大学将在 A-level 成绩公布后再发放 offer,根据预估成绩给 offer 将成为历史,以此进一步提高高校录取准确性,提升教育公平。

改革“牵一发动全身”

实际上,在此之前关于改革英国本科录取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但最后往往不了了之,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这需要诸多部门协同配合。业内分析人士指出,想要推进改革还要破解几大难题——

第一,现阶段官方提议是在英格兰地区进行改革,但从长远来看,英国四地需统一改革,英格

兰地区与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若存在 4 套招生规则,无疑为学生申请带来更多困难,但协调四地教育系统并非易事。

第二,英国高校录取中,除了 A-level 成绩,还会通过个人陈述、面试、作品集等多种方式综合评估学生整体素质,改革后,学校在录取中的面试、加试等环节的时间会相对紧张。

孙波表示,如果高校发放录取通知统一集中到 A-level 考试出分的 8 月中旬之后,也会因短时间内集中申请的学生太多而面临压力。

在 UCAS 于近日起草的改革建议中,提出可以考虑让学生在 A-level5 月大考后再提交申请,而为解决高校随后面试、加试时间紧张的问题,将大学开学时间推迟至 1 月。但如若真是这样,开学时间延后也很可能带来毕业时间的顺延,甚至会对毕业年份学生的求职就业造成影响,这些都需要新政真正实施后具体去协调和平衡。

稳扎稳打备考才是关键

在此之前,英国机构曾对 1500 名大学申请者进行过调查,虽然大家还可以接受当前的预录取制度,但有 56% 的被调查者认

为,大学应在收到学生 A-level 成绩后再给出录取结果。

若改革顺利推进,像以往录取中最终 A-level 成绩未达学校要求、“有条件录取”作废、但 offer 资格却已被预录取占用的情况将不复存在。客观来说,这可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圆梦理想高校的几率。“等 A-level 分数公布后高校再录取,中国学生在面对考试、尤其是数学等理科方面的显著优势就能凸显出来了,这会成为他们在申请上的一种优势。”孙波说,但无论怎么变,学生稳扎稳打备考、踏实走好每一步才是最关键的。

UCAS 发布的数据显示,申请今年入读英国大学本科的中国学生有 24430 人,较去年同期增加近 5000 人,增长率达 24%。“近年来,英国连续推出几项比较重要的教育改革,比如认可的语言考试种类更多、有些学校也接受中国高考成绩,等等。从整体趋势来看,英国一直在对国际学生敞开怀抱。”在孙波看来,英国本科录取改革的大趋势日益明显。哪怕步子慢些,但主动调整沿用多年的录取政策,也反映出其推动教育体系自我革新的决心。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悉尼留学记——在更广阔的天地提升自我

□ 刘沫潇



刘沫潇(右)与外方导师,著名政治学家、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约翰·基恩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我从清华大学以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身份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学习。这是我一生中美好而有收获的一段时光,也是我难忘且珍视的一段回忆。

海外留学,需要主动自觉的学习态度

2017 年底,当我正在联系海外留学的外方导师时,偶然结识了著名政治学家、悉尼大学的约翰·基恩(John Keane)教授。那时恰逢基恩教授来北京大学讲学,我抓住机会,不仅参加了他的讲座,深入了解了他的学术思想,还就讲座主题对他进行了访谈。那次访谈不仅促成了我和基恩教授的师生缘分,还成了我博士论文选题的重要来源。

2019 年初,我登上从北京飞

往悉尼的航班,正式开启了留学生活。抵澳时正值澳大利亚的夏季,阳光、沙滩、海水浴场与冰天雪地的北京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刚刚结束紧张的博士生资格考试和论文开题,又面对着迷人的澳大利亚风光,但我的心情却一点都不轻松——接下来的一年,我将面临巨大挑战:以 1 万余字的开题报告为基础,完成博士论文初稿。

安顿好住所后,我马上与基恩教授取得了联系,告诉他我想尽快与他见面并聊一下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作计划。第一次见面,教授在家里设宴招待了我,在讨论论文主题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沫潇,这个题目挑战不小。”听到老师这样的评价,我的心情更沉重了。教授或许看出了我的疑虑,随即又安慰道:“我们可以做到。”

“我们”——这两个字是那么简单却给予我力量。接下来的一年更是让我深刻体会到,虽然博士论文写作之路艰难非常,但我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很快,我与外方导师形成了每周一次、每次至少两小时的会面机制,共同设定每章论文写作的时间节点。虽然自己不是最聪明最有天赋的学生,但至少可以

做到认真、勤奋,因此不管多累多忙多难,我都会按时完成导师布置的论文写作任务,不曾拖延。加之基恩教授本人十分重视承诺,经常以身作则,因此我更全力以赴,以不辜负他的期望。每次会面,基恩教授都能给予我许多学术灵感,帮我厘清理论难点,并经常把自己看完标注好的文献递到我手中让我研读。与导师的主动沟通和对自身学习科研的详细规划让我很快度过了留学焦虑期,顺利完成了研修计划。

海外留学,需要兼容并蓄的开放意识

海外留学极大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让我认识到博采众长的重要性。在中外两位导师的帮助下,一年中,我对来自亚、美、非、欧、澳的 50 多位新闻从业者和学者就博士论文主题进行了访谈,汲取各方智慧。访谈对象的选取尤其体现了全球性和跨学科的特点:新闻从业者来自全球不同的媒体机构,学者涉及语言学、哲学、政治学和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新闻传播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交叉性特点,同时,考虑到博士

论文主题的特殊性,我的研究吸纳了大量哲学理论。回想论文写作那段日子,除了田野调查和访谈外,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悉尼大学的费雪图书馆度过,浏览并阅读了 50 余本相关英文专著,其中包含很多具有挑战性的哲学论著。

回想在澳大利亚的岁月,调研、阅读与写作占据了我的生活大半,除了去墨尔本调研澳大利亚的新闻机构外,我都待在悉尼,没有再去澳大利亚其他地方游览。然而,我对此并不感到遗憾,因为这段经历带给我的充实、满足与幸福已远远超过任何澳大利亚美景。

2019 年 11 月,在抵澳 10 个月时我终于完成了 20 余万字的博士论文初稿(含 9 万字访谈实录)。在研修报告的导师评语栏中,基恩教授对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写道:“本论文结构良好,具有原创性,一定会作为一本重要的书籍出版”。看到这导师的肯定,这么久的辛苦与疲惫仿佛都消散了。

海外留学,需要积极健康的生活状态

孤身来到异国他乡,除学习外,生活也是门大学问。英语学习、体育锻炼和亲密的室友关系让我在澳大利亚保持了积极健康的生活状态,快乐充实地度过了留学生活。

英语是我的强项,但语言是

一门习得技能,稍有搁置便会遗忘生疏,因此我一直坚持每天利用英语学习软件打卡学习。从 2018 年 3 月开始,两年多的时间里,除极特殊情况,我都坚持当天打卡,学英语对我来说已像是一种内化的生活习惯。

“为祖国健康工作 50 年”是清华的体育精神。健康的体魄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也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的表现,而运动更是一种培养坚强意志品质的方式。在悉尼时,我坚持一周 5 天、每天 2 小时的健身房运动,不仅减重 30 斤,还极大提升了身体素质,在外一年连小感冒都没得过,身体状态一直很好。

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身在国外,好友的陪伴与帮扶十分重要。我很幸运地找到一位“投脾气”的好朋友——同样来自清华的王梦彤。我俩相识于学校的出国留学群,并一起相约在悉尼合租学习。梦彤是我的室友、我的学伴,更是我的人生挚友。我们不仅一起生活、玩乐、分享喜悦,更互相监督,结伴自习,在对方遇到困难时倾听体谅、相互帮扶。

如今,回想博士期间这一年的留学经历,自己不仅完成了既定科研任务,还收获了宝贵的师生情、同学情,养成了自律自觉的生活习惯。这其中既有自己的努力,更有国家和学校的资助和支持,师长谆谆教诲和提携以及挚友和家人的关心体谅,而这段旅程,也将成为激励我继续拼搏奋斗的不竭动力。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